

3.07

龙岩文史资料

第十八期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2.3

龙岩文史资料

第十八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龙岩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目 录

忆旧谈往

- 向封建社会宣战……………黄 薇 (1)
- 文明戏及其他
- 记与郭滴人相处的一些片断……………郭旭濂 (8)
- 共演文明戏，分走人生道……………郭 材 (18)
- 怀念九中……………温公颐 (22)
- 故乡的泉水……………邱治民 (25)
- 记忆中的岩师……………哑 修 (27)
- 纪念我的二舅公……………陈三黛 (36)
- 龙岩年景……………林锦发 (38)

人物春秋

- 爱国归侨张德熔传记……………郭依萍 (44)
- 一代宗师郭庆光……………郭 材 (49)
- 林仙亭传略……………陈仙海 (52)
- 体育先驱郭美周……………郭材、张帆 (56)
- 萨镇冰在适中……………林宪曾、谢明星 (58)
- 陈祖康叛变之后……………林 南 (61)

胜景与碑刻

- 郭公庵与石山园……………郭深训 (64)
- 丞相垒……………谢明星 (70)
- 牛岩洞仙人冢碑刻……………谢茂源 (72)
- 适中蓝田龙岩洞……………谢 尼 (73)
- 龙岩的石雕和碑刻……………章铁英 (74)

史料撷拾

闽西建置史料校正·····	熊寒江(77)
崛起的乡镇建材工业·····	连子丹(80)
龙岩地产中药材·····	郑骥良(82)
龙岩的小地震·····	祈 乐(86)
人口分布中的城乡差异·····	连 理(88)
建国前的龙岩邮境·····	邱梓松(89)

旅外史话

岩人往外经商综述·····	郭 翔(92)
江山华侨概况·····	吴礼庠(100)

民间故事

郭景轩与积山小学·····	郭 杰(103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高知名录

龙岩籍高级知识分子简况·····	资料室(109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来函选载

读史琐谈(一)(二)·····	郭 材(122)
《铁山乡志》读后意见·····	林思安(126)
订正·····	林嵩元(126)
史志简讯·····	资料室(130)

忆旧谈往

这里刊发一组岩籍旅外人士的忆旧文章。他们是：曾于抗战时期驰骋华北战场的著名女记者、其后曾历任海外侨报及香港新华分社总编的黄薇，高级经济师郭旭濂，高级工程师郭国材，南开大学教授温公颐，福建医大教授邱治民，旅加拿大女医博士陈亚修，还有旅居港台的林锦发先生。他们所写多是青少年时期的亲自经历或见闻，虽非耸人听闻的家乡大事，却多少反映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社会风貌和年青人的心态，弥足珍视。

· 编者 ·

向封建社会宣战

黄 薇

二十年代的龙岩，是一个封建落后的社会。男女婚姻不能自主，都是凭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而定终身。尤其是妇女，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地位，“三从四德”、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等等旧礼教，把妇女压在社会底层。她们自小就象商品一般受人摆布，有的一、两岁就给人做了童养媳，有的甚至被人指腹为婚。女孩子到了八、九岁还没有人来说媒，做父母的就感到脸上无光，十分焦急。十四、五岁结婚是常事。这些都严重地损害着女孩子的身心健康。

包办婚姻

我生长在旧社会，当然也不能不过这一关。在我四、五岁还

完全不懂事的时候，就被许配给了当时的福建省议会议长郑丰稔的次子郑福民。这门亲事究竟是怎么订下来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据后来了解，主要是由于郑丰稔的女儿嫁给我的一个远房堂兄，成为我的堂嫂。这个堂嫂很喜欢我，想到她的第二个弟弟福民比我大一岁，年龄相当，家庭也算是门当户对，想要撮合这门亲事。她回娘家一说，她母亲也很同意，就托人来说媒。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，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，两个哥哥都在外地，她一时拿不定主意，不敢答应。后来是我的四叔（黄宝枢）表示同意的。我四叔当时是广东省的一个县长，又曾任家乡第九中学的教员，他在官场同郑议长有些接触，想到如能促成这门亲事，对他的官运也有好处。于是由他作主就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了。听说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，男家还把双方的出生年月时辰拿去算命卜卦，征得了神灵的“同意”。就这样，在我四、五岁的小小年纪就被订下终身大事了！

记得在我八、九岁，只是龙门学校的一个小学生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母亲带我到赤水村去，说是郑家请我们去参加老祖母七十大寿的庆祝盛宴。当然母亲也带了许多祝寿的礼品去。

到了郑家，只见屋里灯火辉煌，宾客盈门，大多是穿长袍马褂的贵宾。大厅里和走廊上，挂满了各色绸缎缝制的喜幛，上面题着“福如东海、寿比南山”等祝词，都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各界头面人物赠送的贺礼。许多人前来向老寿星作揖拜寿，唢呐队吹奏各种曲子，充满喜庆的热闹气氛。宴会的规模很大，宴席数十桌。大厅摆不下，还在隔壁的两层楼房里设宴款待来宾。

宴会之后，议长夫人带我和母亲到她屋里去。一会儿，一位身穿长袍马褂，看来很威严的长者走进屋来。他同我母亲寒暄了几句，母亲让我叫他“公”，我莫名其妙地顺口叫了一声。他微笑着点点头就坐了下来。他温和地端详着我，问我在学校读书的情况，并且拉着我的手，仔细地观察我的手心，看了左手又看右手，然后点点头说：“很好！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郑议长。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、父亲般慈祥的长者。他夸我很大方、聪明伶俐，很可爱。

我在龙门学校上完初小之后，就到城里的公民学校去上高小。这是公民学校新设立的女生部。因为当时很少有女孩子上学读书，女生部只有学生九个人，其中有两人已经结了婚，年龄只有十多岁。我是全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但被选为班长。郑福民也在公民学校上学，他在男生部。我们有时也曾碰见，但彼此从未谈过话。至于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，这对于一个十一、二岁、整天蹦蹦跳跳的我来说，当然什么都不懂。

自我到了公民学校之后，郑议长就开始给我写信。他要我给他写回信，并且把我信中写错的字改正后又寄回给我。高小毕业后，我要上中学。郑议长同意我到厦门集美学校去，并且表示要给我以资助。这说明他已认定我是他未来的儿媳妇。当时他的儿子福民已经去了集美中学。

到了集美，我考上了女子师范学校(四年制)。这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、设备很完善的中等学校，规模很大，全校有学生数千人。陈嘉庚先生是一位具有卓识远见的爱国华侨，他倾资办学，不收学杂费，当时在学校寄宿的学生连吃饭都免费。集美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，多数是福建省的学生，也有台湾、广东和海外华侨青少年。我们“女师”学生数百人，也有几个同学已经结了婚，我仍然是全班中最小的一人。郑议长的侄女郑惠英也在这所学校里，比我高两班，很活跃。她受伯父委托负责照顾我。

郑议长照旧经常给我写信。他看到我进步很快，并且知道我从小学到中学，年年考试都是名列前茅，非常高兴。他要我努力学习，说我将来必将成为郑家的一个不第进士，字里行间充满对我的真心疼爱，并且寄予极大的希望和期待。他以一个身居高官要职的大人物，在百忙之中对我这样一个小孩子如此关心，经常写信予以鼓励，实在令人感动！

解除婚约的斗争

随着环境的变化，年龄的增长，我的求知欲望不断增强。我在课外时间看了许多书报，接触到进步思想，逐渐认识到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。由于我活泼好动，又是学生会的一个委员，学校里组织的一些活动，都有我的份，而且还经常担任主角。郑福民看到这种情况，不以为然。他写信向父亲告状，说我在学校里抛头露面，又演戏、又唱歌跳舞，简直不像一个女孩子的样子。本来，郑议长从我的书信当中已经发现我的思想在变化，因此在接到他儿子的信之后，受到很大震动。他担心，怕我飞走，决定要把我拴住。于是，他从福州写信来，要我回家去结婚。

这封信好似一个晴天霹雳，沉重地打击着我。事情来得这么突然、这么严重。怎么办？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结婚意味着什么？我对此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。我能服从吗？我能做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吗？不能！我不能承认这种包办的婚姻。

这时候，我的胞兄黄复康（文澄）已经来到厦门大学教务处任职。厦门同集美仅一水之隔。我请哥哥到集美学校来，我向他声诉，表示我决不去结婚，并且考虑要向郑家提出解除婚约。哥哥自小就十分疼爱我，他也不同意我这么小就结婚；但他认为郑议长对我很重视，不要一下子就提出解除婚约的问题。于是我回信给郑议长，委婉地说，我年纪还小，中学还没有毕业。我喜欢读书，将来还要上大学，我不能回去结婚。郑议长仍然坚持要我回去结婚，但表示他决心培养我，婚后将让我继续上学。很明显，郑家之所以坚持要我回去结婚，无非是要让生米煮成熟饭，成了郑家的人，我就跑不了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感到再也不能含糊了。我必须明确表示我反对这种包办婚姻，要求解除婚约。于是我再一次给郑议长写信，首先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的爱护和培养，然后说明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，表示我不能接受这种包办婚姻；为了我的前途，我要求同郑家解除婚约。郑议长接到我的这封信，感到极大的失望

和震惊。他感到脸上无光，再也不能容忍了。他老羞成怒，决定派军队来学校，用武力把我抓回去。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，我只能采取果断措施，逃离学校。因为校领导叶渊等人也是属于封建老朽之辈，同时慑于郑议长的地位和权威，如果郑家真的派军队来，他们肯定会把我交给他们。因此，我同哥哥商量之后，决定给学校留下一张请假条，趁人不备，逃到厦门去，到一个同窗好友家里躲起来。到了厦门，我同哥哥的联系更方便了。我们进一步商量，决定我再给郑议长写信，告诉他，我已经离开学校，校方不知道我的去向，派军队也无济于事，并说明我的决心已定，不可能改变。希望他顺应时代潮流，同意我同他儿子解除婚约；同时，由我和哥哥联名给母亲和四叔父写信，说明我坚决不同意这种不合理的包办婚姻，要求他们支持我退掉这门亲事。

一个普通老百姓的“黄毛丫头”竟然敢向有权有势的郑家提出解除婚约。这件事立即在家乡引起极大的轰动。各种议论油然而生，有的指责我大逆不道，有的说我胆大包天，也有人为我担忧。郑家的人依仗权势向我母亲施加压力，三天两头来逼婚，要我母亲以病重为由骗我回去；一些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则出于“好心”，极力劝告我母亲，说郑家有钱有势，你女儿嫁过去，将来荣华富贵享用不尽，你这做母亲的也光荣。象郑丰稔这样的家庭，别人要高攀还攀不上。你女儿有福不享，你应该劝她回来结婚才是。母亲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，处境极为困难。她虽然不完全理解我的革命行动，但她疼爱我和哥哥，相信我们的行动不会错。因此，她对郑家前来逼婚的人说，这是我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她不愿意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她还毅然把当年郑家给我的聘金、聘礼全部退还。我母亲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家庭妇女，能够顶住各方面的强大压力，排除旧礼教的束缚，支持女儿的抗婚行动，确实很了不起。但郑家坚持要人不要物，不肯收回这些财物。后来还是我那当县长的四叔，在家乡有较高的声望，出来为我母亲解围。他对

郑家的人说，她女儿远在厦门，她本人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不肯回来。她母亲一个妇道人家，有什么办法？你们不要再逼她了。同时他还按照我和哥哥的意见给郑议长写信，帮助我们说话。他一方面对我的反抗行动表示歉意，同时要求他理解我的心情，同意让我退掉这门亲事。郑家看到这件事已确实无法挽回，坚持下去没有好处，只好同意我解除婚约。这样，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复杂的斗争，我终于取得了胜利。

郑议长对于我的造反，确实感到很失望也很难堪，我也理解他的心情，但我不能为此而屈从于封建礼教，牺牲自己的前程。此后我们就不再通信了。但郑议长毕竟是有学识的开明人士，他为人正直，平时对封建迷信、旧礼教等也常持否定态度。因此，他逐渐理解我，而且经常想念我。

一九五二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我哥哥复康从侨居地新加坡回国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。政府安排他参加“归国华侨观光团”去各地参观访问。到达福建时，听说郑老(丰稔)受到政府的器重和照顾，任福建省文史馆员，住在清静优美的鼓浪屿，从事撰写福建文史。他便前往探望。郑老见到我哥哥，喜出望外。他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，并且坦诚地表示：“我的儿子虽然忠厚老实，但平凡无能，确实配不上你的妹妹。如果当初真的成亲，那就要误了你的有才学的妹妹”。哥哥感谢郑老当年对我的培养和爱护。他看到老人体质较弱，留下一些钱给他补养身体。临别时，郑老深情地说，他多年来一直很想念我，并且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见我一面。哥哥转达了他的愿望，希望我能争取去看望他老人家。我当时在北京，因为工作比较忙，一时走不开。没有想到第二年(一九五三年)他就与世长辞了。我未能在郑老去世之前见他一面，深感内疚！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、通情达理，曾经真诚地疼爱我、培养我的慈祥长者，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永远怀念他的。

向封建卫道士宣战

但是，我的斗争并没有结束。事隔一年，我以优异成绩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了。集美女子小学的校长决定要聘请我到该校去任教。可是“女小”的这个决定遭到校董叶渊的否决。他指责我同郑家解除婚约是社会的叛逆，没有资格为人师表。叶校董的这种恶劣态度，引起我极大的愤慨，我坚决要向这些封建老朽之辈宣战。我义愤填膺，写了一篇文章，控诉叶渊之流因我反抗封建婚姻而剥夺我任教的权力。我指出，正是他们这些逆历史潮流的封建卫道士，才真正没有资格担任这种培养人才的神圣职责。我向社会呼吁，支持妇女要求解放的斗争，维护妇女争取做一个自由人的权利！

这篇反对封建制度的檄文在厦门日报上发表后，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。该报编辑写信给我，赞扬我的革命精神，并且欢迎我继续给该报投稿。一些读者写文章对我的行动表示支持和鼓励。个别思想进步的老师看到报上发表的文章，悄悄对我表示赞赏。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位生性文静的大家闺秀，很喜欢我，她看到我的文章，也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一篇短小的文章竟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。我感到许多人已经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，逐渐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。我的斗争不是孤立的。同时，它更使我认识到报纸的巨大作用，使我对报纸产生了感情，从而激发了我想当新闻记者的念头。而这个念头竟在我后来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，我从日本回国后，就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抗战。我以手中的笔，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斗。我就这样选择了最适合我的性格和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新闻工作。这一点则是我当初所没有想到的。

（1990年5月26日于北京）

（下转第8页）

文明戏及其他

——记与郭滴人相处的一些片断

郭旭灏

本文记叙了龙岩革命领导人郭滴人1925年间在其家乡任小教时的一些社会活动。参与活动的不少进步教师 and 知识青年，尚存活在世的只剩作者等一、二人了！所记资料鲜为人知。 · 编者 ·

1925年冬，湖洋乡郭厝排广场准备首次演出文明戏。这是一个有着三四千人口、五所初小一所高小的大乡村，不请戏班子的新式文明戏，是乡中非同寻常的大事，人们十分关注，孩子们更是翘首以待。总主持人郭尚宾（滴人，新积山初小校长）负责安排节目，其中有“朗诵”一项，他指定要罗炳炎预先习熟新旧诗词内容，到时登台演出。炳炎细看了节目清单，为难地说：“我不晓得怎样朗诵！”尚宾说：“千万不可象老学究那样摇头摆脑，毫无感情；要有适当的感情语调及适度的动作来表达朗诵的

（上接第7页）

【本文作者和郑惠英、张翠君都是湖邦社人（龙门镇），是二十年代龙岩最杰出的女孩子，她们反抗封建婚姻，毅然解约的行动，曾使当时死潭一样的龙岩社会激起波澜。本刊第十二辑中的《三个女叛逆》曾对此有所记述，但不够翔实，甚至有小错。本文作者虽只回忆自己的往事，未兼及郑、张两位女士，但写得真实、生动，十分感人。· 编者 ·】

内容。请灏生兄具体帮助你，再半个月正式演出”。灏生从长衫袋里掏出一本《白香词谱》，里头每个字旁都有圈圈点点（代表平仄，可平可仄的符号），我们大家感到有趣，自愿陪太子读书，做个侍读，跟着“诒”了起来。当灏生讲到“惊寒雁，起城乌，画屏金鹧鸪”这阙意境时，我们一班人不约而同的“啊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这个小本子，里头竟有这么大的天地，什么意境？而意境又这么深邃，”叹为观止。

高材生就是高材生，炳炎上台朗诵，从举步、进退，吐字、断句，字字吐得清，句句断得明，抑扬顿挫，引人入胜。用灏生的话说：“炳炎的朗诵，会把人引入词的意境中去。”炳炎朗诵后，退到后台时，灏生搂住他，不住在背上拍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柏霖也频频地说：“成功、成功”。这时罗光兴（炳炎父亲）来到后台，尚宾一眼看见，就大声说：“光兴叔，你来呀，欢迎欢迎，炳炎的朗诵很好呀”。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，光兴压低调门轻声说：“炳炎年轻，不懂事，希望大家指教。”尚宾说：“不！不！炳炎很用功，他是个朗诵家，将来可能成为诗词名家。”这时，后台热闹过前台，感情溶于成功之中。

之后，乡社演文明戏，有朗诵节目，就有炳炎的身影出现，成为朗诵节目的台柱。

文明戏另一个节目是“独奏”，人选久久未能定下来。一天，我们几人又去新积山学校，一路上向乐生发问：“你真的会拉四平调吗？”“你拉的四平调和老九师傅的四平调相同吗？”尚宾听到这个发问，感到奇怪，就问：“你们问这个四平调做什么？”原来在此之前几天，开明右手的“福坛”又上演一年一度的汉剧，开锣之夜，演出“游龙戏凤”。我们这班人，成了当然听众。可是一不懂戏文，二不懂音乐，实在只是看热闹而已。唯有乐生不同，他站在戏台前，目不转睛盯住台上老九师傅的吊规（京胡），耳朵静听拉出四平调的音谱。奇怪的是乐生听完后，居然

会照样拉出四平调来。当他喜欢地告诉我们，他会拉四平调了。我们却不相信：“从来没听过，只听人拉一次琴，就会把听到的音调照样拉出来”。认为他说大话，欺骗我们。于是走在路上发问穷追，尚宾听后说：“好，我去借把吊规，乐生你拉给我听听。”乐生拉了一遍。尚宾问：“这就是游龙戏凤的四平调？你再拉一遍，其他的曲调也拉一些。”于是乐生拉一段好长时间，好几个曲调。尚宾觉得他拉得不错，有板有眼，就说：“好，独奏节目，由你担任，我请个‘饶平吹馆’的人来和你对练，到时你登台演奏。”

乐生在台上用吊规拉了四平调等三个曲调。居然台下有人叫好，还有人鼓掌，其中有个叫郭廷标的，他是饶平吹队的唢呐手。

乐生从台上回到了后台，突然大琴师麻皮老九来到后台，拉住乐生的手，不住地摇，口里念着：“贤侄！贤侄！你真硬门（有本事），真脚扫（好角色，有才干），拉得该（这样）好，你跟那个师傅学的？呀！真是祖公有灵。”原来，乐生演奏时，老九师傅也是听众之一，大概出于知音，跑到后台来。大家为老九师傅纯朴的真情感染，喜悦的气氛为之升高，这时我们几个人惊呆了：“老九师傅都说乐生硬门、脚扫、证明乐生没有说大话，不相信也得相信。”于是我们对老九师傅说：“四平调是他站在台下听你拉学来的。”尚宾很欢喜，手尽在乐生头上摸，许久许久，才对乐生说：“你，你很成功，很成功，你会是个演奏家、音乐家。要努力，努力！”尚宾又对老九说：“乐生拜你做师傅好吗？”，老九说：“那里，那里，我贤侄比我还强。”贤侄长，贤侄短，老九认为自己额头也高三分。

这时台前继续演出，人逐渐散去，只见柏霖走到尚宾面前说：“尚宾！我现在看清楚了，你是个知人善任的人。”尚宾谦恭地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，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”。

从此，我们几个人再也不敢说：乐生在拉琴方面说大话。

从此，我们朦胧地认识到，人有天资，潜质（或许是基因）

的不同、差别。

从此，我们时时想起柏霖的话，尚宾是个知人善任的人。

废科举办学堂，开明小学应运而生，到1925年寅班学生毕业。已是十三届了。前后毕业的二百多人中只有三十多人升学，其中十多人上大学（一人出国留学，取得博士学位，当时龙岩仅此一人）。多数人限于家庭经济，只好当店员或任初小教员，或回家种地，有的则去南洋谋生。久任小教的郭柏霖、郭灏生（二人是有名的青年书法家），有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，想去日本求学，尚宾赞成他们的想法，于是想搞个助学金，要求在全湖邦社共有的“十股半”产业（租谷）的收入中拨出小部分作为助学金。他们三人首先去找宦归故里的黄宝枢（是开明学校创办人、首任校长），想得到他的支持。

黄宝枢说：“我赞同，但无能为力，无权！”

只好去找更有声望的郑笔山，郑说：“你们是小学生，未闻小学生可以出国留学！”

他们又申说：“毕业多年来，都有不停进修。想到日本先入补习学校，然后再考适当学校。”

郑说：“唉呀，不要想这些贻误的事，我这个拔贡就不是留学日本得来的。”

尚宾接着说：“现在时代不同，需要科学，要适应新思潮、新潮流。”

老郑听不得这种辩驳，发火了：“什么时代不同，什么新潮流？你知道吗，魏源说过，执今而律古，是为诬古。”

尚宾说：“不，我只是想乡社有可能时资助一些人去留学，学点新知识，并不想诬古。如果说适应新潮流是诬古，那胶柱鼓瑟，执古而绳今，则是诬今，比诬古更可悲。”

于是不欢而散。不久，“十股半”的公产被豪绅拔去办“湖邦社民团总队”。而老郑在他周围的许多人前则常有称赞尚宾。

说：“尚宾真有‘两下半’，将来可能是个大人才，他那样年轻，已经读过魏源的书（诬古诬今都出自魏源），还十分精通。”

新积山校常常有农民来夜读，尚宾同他们谈得很和洽。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叫“迈二”的向尚宾诉说，母亲去世，丧费无着。尚宾即刻拿出两个大头（银元）给他，安慰他凑就去办。这事使很多人都极受感动。因为大家工资都低，我在龙门小学每月工资只三个大头。尚宾家里穷得出名，不可能常有余钱接济人家。广大农民之所以同他心连心，亲密无间，是因为他真切同情农民的疾苦，事事为农民着想，他讲的大道理都是农民信服的，因此潮邦大反种植鸦片烟时，他振臂一呼，广大农民都热烈响应，掀起了全县的风浪，终获胜利。

1924年，赣军赖世璜来到龙岩。赖和粤军陈炯明入闽时一样，迫令种植鸦片烟。

小孩的时候，听老人说过：许久以前，社内曾经种过鸦片，但近二十年未有种过。就说贩卖鸦片烟土，社内也只有山墩头老刘中医是瘾君子，并卖鸦片泡，胃病的人吃鸦片泡，可以止痛，是作为药用的。人们对鸦片无甚兴趣，尤其种鸦片，更是毫无把握，诚恐种下去，收成不好或失收，就会全家口粮无着，成为饿殍，是以越趑不前；但社长、家长压着下来，催着要种，少数人就领了鸦片苗种了下去，例如：开明学校对面的大丘田就种了，（后来没有见到开花结果，原因不详），而大多数人，都不愿种，多方逃避，但又恐农时过去。议论纷纷，彷徨终日，心中如焚。这时富有正义感的郭尚宾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他说：“这些军队，只顾扩充势力、地盘，不顾人们死活，简直是军阀。自从拉挑伕、偷牵牛，派挑夫费，已弄得全社鸡犬不宁，现在又要种鸦片，直欲置人们于死地！”他站了出来，大声疾呼，“反对种鸦片”，到开明、轮升、考塘、必峰、龙门、志兴、赤水、元理等

小学和农民联络，毕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大家赞成，决定择日列队游行，开大会，反对种鸦片。开会之日，只见拿着纸制的三角旗子的队伍、从四方八面汇集龙门圩会场，适逢圩日，人头涌涌，人声鼎沸。记得尚宾在台上讲话，喊出“反对种植鸦片！”提出“打倒军阀”（还有许多教员和农民讲话）。反对、打倒的声浪此起彼落。声讨气氛热烈，奋抗情绪激昂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坊社，也反对种鸦片，有的家长、给扣留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引发了全县各界以各种形式起来反对种植鸦片，卒使赣军头目不得不收回成命。我们这班人，也忙着写粘小旗子。

当然，该头目迫种鸦片是手段，括地皮才是目的，目的是不放弃的——这是后话。

从此尚宾的正义形象，在全县竖立起来了，起了影响和作用。

有一次，我们这班学生问尚宾：“你怎么晓得要用游行、开大会反对种鸦片，迫使成命收回？”这一幼稚的发问、引起尚宾哈哈大笑说：“游行，北京早已有了。军队有枪你无枪，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反对才有力呀！”

这时我们这一班人，似乎有一共同的感觉：“尚宾不只是我们的学长、还是我们的良师！”

假如说，拉挑夫，偷牵牛、派兵担、迫种鸦片、派军饷等是人祸，那涨大水，寒露风就是天灾！

同是1924年，民国十三年甲子，清明已过，老天仍然浓云密布，阴雨连绵，寒潮阵阵。尽管重播谷种，抢插，算是赶上农时，岂知谷雨之后，做了一场大水，陂冲了，田亩淹了十之七八，早稻失收。

人们总是向良好愿望出发，希望晚造有好收成，补回早稻损失。眼见丰收在望，天公偏偏不作美，当扬花吐穗的时候，旧日九月上旬阵阵的寒露风，铺天盖地吹来，大片禾秆倒伏了，埔上